

《西国近事汇编》、李圭《环游地球新录》及西书数种览之。薄游香港,鉴西人宫室之丽,道路之整洁,巡捕之严密,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,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。”梁启超则在《读西学书法》一文中推荐:“欲知近今各国情状,则制造局所译《西国近事汇编》最为可读,为其翻译西报,事实颇多也。”后来康梁在北京掀起强学运动,改《万国公报》为《中外纪闻》时,所拟订的《〈中外纪闻〉凡例》中,又有“拟仿《西国近事汇编》之例,不录琐事,不登告白,不收私函,不刊杂著”的设想,看重得不输于林乐知主笔的《万国公报》。

## 二、《汇报》、《彙报》与《益报》

国人自办比较完整的新闻纸,是1874年6月16日(清同治十三年五月初三日)创刊的《汇报》(英文名为 *News Collector*)。

《汇报》是在沪的香山籍官绅们,为愤《申报》的不持平,甚至侮辱香山人而负气创办的<sup>③</sup>。北京出版的《中西闻见录》在“上海近事,新设报局”条则称:“兹闻有广东寓居上海者,以从前《申报》持论的有不允处,恐将来有偏袒不公,遂另设一局。”就是明证。关于《汇报》,戈公振在《中国报学史》中称:“为中国第一留学生容闳(纯甫)所发起,集股万两,投资者多粤人,招商局总办唐景星实助成之。”其实这是上了《申报》记载的当。在《汇报》正式发刊近半年前,《申报》打听到了上海知县叶廷眷们正在集资办报。《申报》当时与旅沪香山人之间的关系形如水火,无法探知确切内幕,只知道容闳(也是香山人)也

参与其内,才发了这么一则不实消息。过了十天不到,《申报》了解到了实情,才又补叙称:“首先倡捐者,上海令叶邑侯也,倡议开馆者,唐君景星(即唐廷枢,怡和行买办,上海招商局的创始人)诸人也,倡立馆规者,容君纯甫也(即容闳),主笔诸君,皆近粤中名宿也,机器铅字,皆容君所承办也。”在这里,容闳降而为“倡立馆规”和“承办机器铅字”的人了。而后来又知道《汇报》章程等都是郑观应所起草的。章程中明确写明:“一切局务议交邝君容阶一人总理,以专责成”,都与容闳无涉。有可能倒是叶廷眷们议立报馆时,容闳对如何办好报纸出了些主意,但不被采纳。不然的话,容闳在晚年所撰自传《西学东渐记》中,连当时还视为大逆的为太平天国做事等都一事不漏,而对倡办新报这么件“西学东渐”的大事,为何却一字未著?!

《申报》后来的这个报道,仍不断地被事实所修正。主笔诸君,“粤中名宿”一位也没有,所聘主笔为毗陵管才叔,襄助者为粤东黄子帡和金陵贾季良<sup>③</sup>。但“另延西人代为出名”,那就是原来聘用为翻译的英国人葛理(Grey),冒顶总主笔,被《申报》讥为“赫赫县尹,堂堂粤绅,办此小事尚不敢出头,反请西人露面,未免心欲大而胆欲小矣”。《申报》还不断披露筹办过程中叶廷眷的种种表现:曾定刊名为《公报》,后才改《汇报》;“拟价取每份五文”,等等。《申报》不无感喟地批评说:“君尚有纳谏之心,官则有禁谤之意,故得罪于君犹可逃,得罪于官不可遁也。”“欲设官报馆以灭民报,亦如塞众口而视逞己志。叶邑尊之筹设新报馆者,意申杨月楼一案所基,新报将取《公报》之名,‘公’字其尚可存与?”

从这些情况来看,《汇报》尚未问世之前,与《申报》如冰炭之势已成,两报之间的一场恶战已是避免不了的了。

《汇报》发刊的第一天,《申报》的“贺礼”就是一个“湿爆仗”。

## 禁 放 爆 竹

日前《汇报》局移稟于工部局内,谓欲于夜半施放爆竹以示庆喜。而工部局随即函复曰:夜间因庆贺各礼而放爆竹,业已刊诸禁例。盖以放爆之响,实于邻里不安。曾叠经西人函请禁止。兹若一次弛禁,将继足以求请者当必接踵而至,故未能从也。

在《汇报》发刊以后,起初管才叔主持阶段并未与《申报》笔墨相争,1874年9月1日(清同治十三年七月廿一日)起,《汇报》改由英人葛理承顶,易名《彙报》(英文名称则加了一个“The”字,为 *The News Collector*),成了上海新闻史上最早出现的“洋旗报”,主笔为谁不详,只知道管才叔已辞职,郑观应还经常为《彙报》撰稿,经常执笔作论的还有参加《中国教会新报》编辑工作的钱莲溪和郭福衡等。

《汇报》与《申报》之间的大笔战,就是在改名为《彙报》之后开展的。

易名《彙报》之后的最早一桩争论是,关于天津兵变的消息的处理问题。那时正值日本侵台期间,上海人心惶惶,因此上海官宪力劝《申报》暂时不刊天津消息。《彙报》却在《字林西报》上发表了一个声明称,过去“受制于官吏,不难放笔”,而在报上抢先发表了天津消息,成了《彙报》的独家新闻。《申

报》怒而谴责，“岂以《彙报》官宪自设始可详言此等事耶”，拆穿了《彙报》的“假洋鬼子真官报”企图独占新闻的面目。

接着争论的是吴淞火轮车铁路事。吴淞铁路是英商无视我国主权，用欺骗手段擅自修筑的。本来《彙报》在维护国家主权的问题上，可以进行义正词严地批评。但《彙报》却放过了这个机会，舍本逐末地与《申报》争论“火车利弊”，会不会失事，会不会撞死人之类。这样的论旨，岂能赢得读者的信服！以后又是铁甲船之争。《申报》主张中国人应购铁甲船，《彙报》则称中国可以自行制造。《申报》回答说：“夫办货之理，以物精价廉两项能兼者为尚，其次则图就便易办焉。”至于自造之船，《字林西报》前年曾指出，福建船政局“自造的船较昂于泰西所买之数倍”。即使这样，《申报》还是表明态度：“本报彼时辩白：花费虽多，而制造局断断不可废也。……本馆于当时已怀偏向西人之意欤？而当前极需，还是购船合算。”“今《彙报》之异于西报者，报虽官设而所陈之利弊，皆似分己无干者。但不能先行后言，并且不能坐言起行，与书生所作制艺，皆属空谈帝德王政而已。然则《彙报》亦仅有虚言而无实利，其无权亦与《申报》等耳，其中又安赖有《彙报》之设哉！”驳得《彙报》气也转不过来。

《彙报》的立论往往极不高明，因此，同《申报》之争论常居下风。《申报》不仅咄咄逼人，而且仍旧不断揭露攻讦上海县令叶廷眷喜用酷刑逼供的事。1875年3月25日，叶廷眷纳捐升道班，5月28日交卸县篆，《彙报》因此“清理账目加入新股”。1875年3月25日（清光绪元年六月十四日）改组出版《益报》。

《益报》(英文名为 *Useful Knowledge*) 以华亭宿儒朱逢甲为主笔, 未见续有的西人出面的材料, 与叶廷眷、唐廷枢等关系如何不详, 只知道报馆是搬到新关后福来里去了。朱逢甲与《申报》论战, 更不高明, 只能“横驳肆骂, 且每报一张而骂至一、二、三者甚至四篇不等”, 而且落笔便错, 谬误百出。如《申报》报道英人新创大炮长 27 呎, 径 6 呎, 为当时世界之最, 《益报》则称中国已有三四丈长者; 《申报》劝中国开矿不复往泰西购买煤铁, 《益报》则称为“诡计”, 并曰“开矿必乱”, 甚至进行人身攻击。《申报》馆不愿与之逐篇纠缠, “是知横逆之加正言, 与凶锋而远避之也”, 乃于 1875 年 10 月 11 日, 发表著名“首论”《论本报作报之本意》, 提出“若本报之开馆, 余愿直言不讳, 原因谋业所开者耳。但本馆即不敢自夸, 惟照义所开, 亦愿自伸不全忘义之怀也”。《申报》这种光明磊落的态度, 当时就赢得读者的同情和尊重。从《汇报》、《彙报》到《益报》挑起的这场笔战, 愈来愈成为一场闹剧。而《申报》反而大大获得实惠。《益报》12 月 3 日刊出朱逢甲离职的声明, 第二天即 12 月 4 日就寿终正寝。从《汇报》创刊算起, 共存世一年半光景。

国人办报尝试的第一种较正规的新闻纸, 竟是这样一个历史过程! 它当然仍在新闻史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贡献: 国人自办的新闻纸, 因为已有《上海新报》乃至《申报》所创的模式来作仿效, 一开始就是成熟新闻纸的“整株移植”, 而且还有所创新, 如每期报纸的重要文章都有“要目”, 显要地刊于第一版等。而且上海知县叶廷眷等为对付《申报》的批评采用另办报纸来对抗而不取禁止等手段, 固然主要由于

这是他的权力所不及,但他的胆敢冒险办报,至少在他看来办报也已不是不可沾染的事,而且也可以拿来为我所用,只是有恐朝廷责难,才采取挂洋旗的办法。再有,国人尝试办自撰论述的报纸,竟既不是事出政治上的某种严正目标,也不是建基于经济上的需求,而竟出于负气,正也反映了国人自办报刊在那时的主客观条件还不甚成熟,当时还不大可能自办成功有前途的报纸。

### 三、冯焌光和《新报》

1876年11月23日(清光绪二年十月八日),曾在江南制造局发刊《西国近事》报的冯焌光,又创办了每日出版的《新报》。

冯焌光是当时有名的洋务官员,他1875年1月由江南制造局总办接篆上海道的。首先遇到的棘手的是中外交涉的吴淞铁路问题。那条铁路的路基本来只同意修筑马路,1874年7月却以资金不足为由改组为吴淞铁路有限公司,已开始全面施工。这是无视中国主权的行为,清廷责成冯焌光交涉收回。在冯焌光交涉的过程中,上海的外商报刊包括《申报》在内,无一不帮那个英商铁路公司说话,为抵制外商报刊的舆论,冯焌光在吴淞铁路交涉有眉目之后,就着手筹办《新报》。《新报》创刊的第一号,就发表了《铁路会议条款》,宣布吴淞铁路由中国政府收回,听洋商公司继续承办运行一年,盈亏与中国无涉。——这全套文件,还用中英文同时刊出,比上海当时所有报纸都刊得周全,像一张官方机关报的样子。